

中山精神薪火相传

——上个世纪至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孙中山研究

王 颜 刘 嘉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陈锡祺教授（左二）和孙中山研究室其他老师一起研究孙中山问题。



▲林家有教授（左一）、桑兵教授（右二）在孙中山像旁与其他学者、校领导合影留念。

在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社会里,孙中山无疑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孙中山也同样是一位划时代的伟人。一个世纪以来,对孙中山这位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的杰出人物的研究和宣传以及认识和了解,不仅逐渐成为一门跨世纪的“学科课题”,更促进了一代学人的论著如雨春笋般地涌现。中山大学作为孙中山一手创办的高等学府,对于孙中山的研究至始至终都不曾懈怠。陈锡祺、陈胜彝、林家有、段云章、周兴樑、邱捷、桑兵,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正是为中山大学进行孙中山研究付出了无数心血和汗水的学者们的杰出代表。岁月峥嵘,学理沉蕴,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光辉历史。

筚路蓝缕 白手起家

1949 年以前,尽管学术界对孙中山表示崇敬,出版过一些孙中山的文集,但孙中山并未成为真正的学术课题,一些传记、年谱、著作、资料不够充分。从 1903 年章士钊摘译辛寅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而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中国学术界似乎才开始对孙中山研究有所关注,但长时期以来孙中山在国外学术界所受的重视高于国内乃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孙中山研究,陈锡祺教授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陈锡祺幼年就崇拜孙中山,后来又从学于著名的历史学家李剑农、陈恭禄等教授。由于受到中国近代、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后 30 年民主革命历史的启迪,陈锡祺萌发了研究近代中国和孙中山的兴趣。1946 年,陈锡祺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此后历任中山大学副教授、教授,孙中山研究室主任等职。至于他为何会走上一生致力于孙中山研究的道路,恐怕要从 1953 年的一件小事说起。1955 年,陈锡祺接待了来访的苏联著名学者谢宁,陈锡祺从谢宁那儿得知:“苏联即将为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这个想法深深地触动了陈锡祺,他认为:“连外国都如此重视孙中山,我们中国人自己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才对。”此后,陈锡祺教授就下定决心,决定在国内开创孙中山研究的先河。1956 年纪念孙中山 90 周年诞辰之时,陈锡祺献出了他的最早研究成果——《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一文,紧接着在 1957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孙中山研究首次在全国得到重视。《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活动》是新中国第一部研究孙中山的专著,被称为开荒之作,迄今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这也使得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一下子成为了孙中山研究的前沿阵地。

春风初现 徐图发展

1979 年春天,顺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陈锡祺在中山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孙中山的机构——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并恢复了校内的孙中山纪念馆。此时,在陈锡祺、陈胜彝的身后还出现



▲2017 年 11 月 11 日,从各地赶来参加《孙中山史事编年》《孙中山全集续编》发布会的学者在永芳堂门口合影。

了一大批可以协助他们进行孙中山研究的助手。陈锡祺也被誉为“在中国当代学者中对孙中山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一人。在孙中山研究室成立前,陈锡祺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如段云章、王志光等就是陈锡祺最早指导的研究孙中山的研究生。孙中山研究室成立后,陈锡祺又陆续招收了邱捷、周兴樑、陈剑安、桑兵等研究生,陈胜彝也招收了乐正、贺跃夫等研究生,在老师们的精心培养下,他们都成为有造诣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在人才队伍逐渐壮大的同时,研究室便形成一支由老中青组成的研究队伍。

孙中山研究室成立不久之后,担任研究室主任的陈锡祺即指出:“孙中山研究首先应搜集研究资料,其次方能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题研究。”所以研究室初期的任务就是去全国各地收集资料。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困难,一是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二是没有足够的人力。当时的邱捷、周兴樑还是研究生,林家有就带着他们到北京,去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宣部等地到处看报纸翻材料。据林家有教授回忆,由于缺少经费支持,为了省钱,他和两个研究生就租住在相对便宜的北京民族学院的地下室。他们每天一早就出去搜资料,中午吃两个馒头,傍晚回到民族学院食堂,晚上就在地下室睡觉。后来他又和段云章到云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翻阅材料。他们去云南省查滇军首领唐继尧和孙中山关系的材料时,云南省档案馆馆长非常支持他们的工作。由于当时云南省档案馆的材料作为战备还存放在山上,他特地命人从山上一箱箱拉下来供林家有他们查阅。当时,他们就在那里看了十几天的材料,天天用手抄,这才搜集到了许多珍贵资料。林家有教授回想起那段艰苦的研究岁月,不禁感慨道:“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孙中山研究室的所有老师同学都非常团结,师生相处融洽,老师们之间也从无名争利,只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把孙中山研究做好做强。”

砥砺前行 走向世界

到了同年冬天,随着研究孙中山的资料已经收集得相对齐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孙中山研究室牵头与广东省历史学会、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决定联合举办“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这个

研讨会在当时广州火车站对面的流花宾馆举行,邀请了美、日和港澳台、大陆的众多学者参加,场面十分隆重。

当时,林家有教授陪同陈锡祺教授先在白云宾馆接见了杰出的孙中山研究专家——美国学者韦慕庭(Clarence M. Wilbur)。据林家有教授回忆:“韦慕庭和陈先生不用翻译就开始愉快地交谈,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谈。期间,也有谈起他们两个人对孙中山研究的一些看法,谈起孙中山研究的伟大之处,他们的谈话内容对我的影响很大。”韦慕庭在选择前往世界各地参加学术会议时,首先就来了广州,并表示一定要见陈锡祺教授一面,他还把自己的英文著作《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赠给陈锡祺教授。

会议结束后,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名声逐渐扩大,走向海外,不少国外学者都慕名前来访问。如著名的犹太学者哈罗德·史扶邻(Harold Zvi Schiff-ferin)就来过中山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拜访陈锡祺教授,他的孙中山研究成果在中国被翻译为中文,分别是《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此外,德国的金德曼、台湾地区的吴相湘、蒋永敬,香港地区的王德昭,以及日本的狭间直树、久保田文次、岛田虔次、野泽丰、山口一郎、藤井昇三、中村义、山田辰雄、中村哲夫和安井三吉等一批著名学者都与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而孙中山研究室的学者们也时常到香港、澳门、台湾和日本等地进行访问交流。可以说,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对外交流正是因此次学术研讨会逐渐打开的,孙中山研究的学术之路也因此拓宽了许多。

薪火相传 展望未来

1986 年,孙中山研究室改名为孙中山研究所。孙中山研究所的编制最高峰时达到 20 人,力量可谓强大。研究所对孙中山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除编辑和撰写《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研究论丛》外,还出版了不少关于孙中山的研究著作,在学术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近代史研究是从主要研究孙中



▲《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全集续编》《孙中山史事编年》。

山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的,逐步扩大到研究辛亥革命、近代社会思潮、政治制度与社会变迁、政治人物、学术史、教育史、近代社会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等。孙中山研究所的科研队伍结构合理,老中青分布均匀,这也是近代史研究得以长青的保障。

作为新时代孙中山研究的领军人物,孙中山研究所的现任所长,桑兵教授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仍有进一步拓展、提升和深化的必要。桑兵教授正准备重写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北洋的历史,因此,孙中山的历史也大有进一步拓展、提升和深化的必要,只是这方面的研究规模很大,不是出一本书就能做得完。桑兵教授有着远大的计划,就是扩展视野,从大规模搜集梳理资料入手,搭建一个孙中山研究的新平台。2012 年,由桑兵教授主编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不仅如此,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还计划编辑出版《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以孙中山生前和 1949 年为界分成三辑,每辑若干卷。此外,桑兵教授已经主持完成的另一项工作就是编纂《孙中山史事编年》,这项工作早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之前就已经启动,至今历时五年多。《孙中山史事编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计五百余万字,是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又一重要研究成果。该书于今年校庆期间发布。

纵观孙中山的一生,是联系着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一生,尽管迄今为止,已有大量的孙中山研究的著述问世,却并不代表孙中山研究已经没有空间。正如桑兵教授所言:“到现在为止,孙中山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许多人因此觉得孙中山研究已经没什么可做了,也有人说可拓展的研究空间比较小,但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孙中山的研究,只有在与历史时代的同步考察过程中,通过新的理解和新的观点,依托新的资料,找到新的切入点,才会有新的观点出现。同时,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道路,不仅是在中国社会下特有的现象,而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特有现象。只有把他的一切放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范围内,才能弄清楚他的主要事迹和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

孙中山是中国社会和革命发展的一个时代的代表,他的事业和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有着众多的课题等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我们探究孙中山,弘扬他的思想和精神,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把历史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而是把伟人伟业薪火相传,继续开来。所以,在新的 21 世纪,孙中山研究者所面临的工作,仍是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专访】

马骏教授研究团队:为鼻咽癌治疗贴上中国标签

党委宣传部 科学研究院

编者按

本篇报道为“中山大学科研成果系列报道”的第三篇,介绍我校肿瘤防治中心马骏教授研究团队以鼻咽癌为主要研究对象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马骏教授率领的鼻咽癌研究团队,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资助下,以鼻咽癌为主要研究对象,取得突破性成果,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改善了生活品质。近 15 年全球通用的美国分期做了 6 项修订,其中 4 项采用了他们的成果。近 20 年世界权威的美国治疗指南仅做了 2 项修订,其中 1 项基于他们的研究。研究成果被评为 2012 年度“国内医学十大新闻事件”及“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马骏教授以唯一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著 91 篇,包括国际排名第一的肿瘤学杂志 Lancet Oncol (IF 33.9)3 篇、J ClinOncol (IF 24.0) JAMA Oncol (IF 16.6)和 Ann Oncol(IF 11.9)各 1 篇;以最后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著 11 篇,包括 Nat Commun (IF 12.1)1 篇。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种医学评议组副组长,获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带领团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2015、2009)、全国创新争先奖(2017)和省部级科技一等奖 5 项,并成功入选教育部和科技部创新团队。

近日,记者采访了肿瘤防治中心马骏教授团队,并请该团队就鼻咽癌 TPF 诱导化疗临床试验作相关介绍。

记者(以下简称“记”):“鼻咽癌 TPF 诱导化疗临床试验”的思路是如何提出的?
马骏教授研究团队(以下简称“马”):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NPC)是我国华南地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同期放化疗(放射治疗同时进行的化疗)联合辅助化疗(放射治疗结束后进行的化疗)是国际上推荐治疗局部区域晚期鼻咽癌的标准治疗。我们既往的研究发现,接受辅助化疗的患者近一半会发生严重呕吐等毒副作用,遭受很多痛苦,治疗效果却并不理想,仍有 20-30%的病人在治疗后出现远处转移。因此,要减少病人的痛苦,改善治疗效果,需要寻找更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案。

诱导化疗是指在放射治疗前使用的化疗,具



- ①“鼻咽癌诊疗关键策略研究与应用”获得 2015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完成人)。
- ②“基于现代影像技术的鼻咽癌综合治疗研究及应用”获得 2009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完成人)
- ③团队带头人马骏教授 2017 年“全国创新争先奖”。

有患者顺应性好,提高放疗敏感性以及降低远处转移风险等优点。研究显示,多西他赛(Docetaxel)、顺铂(Cisplatin)联合氟尿嘧啶(Fluorouracil)组成的 TPF 诱导化疗,显著提高了局部晚期头颈鳞癌患者的生存率,是头颈鳞癌首选的诱导化疗方案,但在同期放化疗的基础上,加上 TPF 诱导化疗能否进一步提高局部区域晚期鼻咽癌的疗效尚未明确。

为此,我们团队牵头全国 10 家三甲医院,历时 8 年共同完成了一项前瞻性多中心 III 期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将入组患者随机分为 TPF 诱导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组(试验组)或同期放化疗组(对照组),比较两组的生存率及毒副反应。该研究在国际上首次证明诱导化疗能够提高鼻咽癌的疗效且治疗毒性可以耐受,病人的生存率提高了 8%,肿瘤转移的发生率降低了 7%。研究结果在全球排名第一的肿瘤学杂志《柳叶刀·肿瘤》发表。这是近 10 年来唯一能够提高局部晚期鼻咽癌生存率,减少肿瘤扩散的 3 期临床试验,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被美国 and 欧洲的指南所采纳,在全世界推广应用。国际同行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 Michael T Spiotto 教授发表同期评论,认为此论文为确立鼻咽癌最佳综合治疗模式提供了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也为诱导化疗在其它头颈肿瘤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此外,中国《健康报》头版头条以《鼻咽癌治疗我国再度领跑》为题进行报道并发表特约评论:《领跑者更需要全方位支持》,同时该项研究成果得到科技日报、中国医学论坛报、健康报、医师报和广州日报等海

内外主流媒体 10 余次正面报道。

记:请介绍一下课题组其他主要研究成果及其临床运用价值?

马:科学发现一:明确辅助化疗不能进一步改善中晚期鼻咽癌的生存,从而使患者避免过度治疗,合理利用医疗资源。放射治疗简称放疗,是国际公认的鼻咽癌主要治疗方法,它是利用加速器产生的射线,从体外射入,杀灭肿瘤。晚期鼻咽癌患者要不要在放疗结束后再打化疗?这是长期困扰医生和病人的疑问。自 1998 年开始,美国指南推荐所有中晚期鼻咽癌患者接受辅助化疗,也就是做完放疗后再打三个疗程的化疗,这一方案成为国际上通用的标准。然而,根据在鼻咽癌诊疗一线奋战二十多年的经验,发现使用这一方案,病人遭受很多痛苦,效果却并不理想。从 2003 年开始,我们团队开展了一项大型临床研究,发现辅助化疗不能提高鼻咽癌的疗效,相反,在接受辅助化疗的鼻咽癌病人中,近一半会发生严重呕吐等毒副作用。这一研究历时将近 10 年,于 2012 年发表于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柳叶刀·

肿瘤》。根据这一研究,晚期鼻咽癌病人可以避免辅助化疗带来的痛苦,节省治疗费用一万多元,减少三个月的治疗时间。目前美国和欧洲的指南已经采用这一研究成果,既能使病人避免不必要的治疗,又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此研究结果同时入选 2012 年“国内医学十大新闻事件”及“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科学发现二:发现特定的一组 miRNA 标签能够反映转移潜能,提高预后预测的准确性,为精准治疗奠定了基础。研究结果于 2012 年发表在发表国际权威的学术期刊《柳叶刀·肿瘤》上,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化疗科主任 Han Chong Toh 教授在 Lancet Oncology 同期评述中指出,此论文的研究成果可协助临床医生更准确地区分高风险的患者,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疗方案,为鼻咽癌“个体化”治疗奠定了基础。同时,该论文被 Nature China (推广中国优秀科研成果的专业网站)作为亮点研究予以推荐。

科学发现三:勾绘“危险地形图”减少放疗毒副作用。鼻咽周围有大脑、眼球和耳朵等许多重要的器官,传统的放射治疗范围并不合理,导致正常组织容易受到株连,疗效差,毒副反应很大。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约 60%的中晚期鼻咽癌病人能存活超 5 年,且治疗后的放射性脑坏死等后遗症发生率高,严重影响着病人的生活质量。我们团队通过分析数千例病人的资料,绘制了鼻咽癌扩散的“危险地形图”,将鼻咽癌扩散范围分为高危、中危和低危三个区域,根据癌细胞扩散危险度的不同,调整放射治疗的范围和强度,既精准杀灭癌细胞,又保护了正常组织。我们联合美

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专家,统一规定了鼻咽癌放疗需要保护大脑、眼睛和耳朵等 33 个正常器官,一一界定了这些器官的安全范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鼻咽癌正常器官的保护标准,在不增加肿瘤复发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毒副作用。研究发表在放射治疗领域首屈一指的著名期刊《放射治疗与肿瘤学》。肿瘤防治中心通过采用新的调强放疗技术,将鼻咽癌病人的生存率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达到 80%以上,放射性脑坏死等严重后遗症的发生率降低了 24 个百分点,降至 44%,极大地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记:可否谈谈对鼻咽癌防治的体会与展望?

马:由于鼻咽癌病变部位隐蔽,患者难以察觉,因此来医院就诊的病人 70%都是中晚期患者,平均年龄约 45 岁左右,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鼻咽癌治疗成功与否对病人的家庭和人生有着重要影响和意义。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对病人的难处更是深有体会。因此要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然后针对临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相关研究,能够更好地解决临床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有了一个好的着手点后,要脚踏实地做事,同时不要盲从“标准”,要敢于“挑战权威”。希望鼻咽癌在广大同行的共同努力下能够早日被攻克。

记:可以介绍一下团队未来的目标吗?

马:能够使鼻咽癌患者得到早期诊断,在进一步提高疗效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为病人“减负”,为鼻咽癌的精准治疗早日实现而不断奋战。

- ①Lancet Oncol. 2016;17(11):1509–20. (快速报道) (IF 33.9)。
- ②Lancet Oncology. 2012;13(2):163–71. (快速报道) (IF 33.9)。
- ③Lancet Oncology. 2012;13(6):633–41. (快速报道) (IF 33.9)。



▲马骏教授团队合影。